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四期 ——
(二〇〇六年一月三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601b)

【史海钩沉】海瑞罢官到“文革”兴起	苏双碧
【参考资料】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司马璐
【千秋功罪】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下）	方 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海瑞罢官到“文革”兴起

• 苏双碧 •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苏双碧

访问时间：二〇〇五年三月

陈晓楠：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而吴晗和他的“三家村”同伴们就成了文革祭坛上最早的牺牲品。

“文革”开始前，苏双碧一直在吴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亲自见证了从批吴晗到文革兴起的全过程。文革后，他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是第一个撰文为吴晗和“三家村”鸣冤的人。

苏双碧：我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历史协会工作。当时吴晗是历史协会的会长，协会没有专职干部，从我开始，就有了一个专职干部，

陈晓楠：那个时候，吴晗还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与共产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民盟党员。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上海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是明朝的大

臣，以敢于直言上谏著称。负责宣传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请他撰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苏双碧：这个吴晗，自从他参加民主同盟以后，他对共产党是坚信不移，对毛主席是敬若神明，所以他就马上动笔写了。

陈晓楠：吴晗欣然受命，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因为直言进谏被免了职，被毛泽东说成是“假海瑞”，吴晗只好匆匆在文章之后加了一段“要提防假海瑞”的话才发表出来。这件事过后，吴晗并没有发现海瑞的话题多了几分敏感。一九六一年，他应马连良的邀请，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说这出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她找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

江青当时提出来要批这个《海瑞罢官》。而且找了四个部长、副部长，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副部长谈话，说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四个部长、副部长听了以后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时主席对这些问题没有表态，就是江青在那边接头，主席没有明确表态这些事。主席既然不表态，谁也搞不起来。另外谁也不会去听江青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转而支持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这场批判。后来，江青也在文章中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在上海，柯庆施和张春桥对江青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找到学术界的棍子姚文元，由姚文元捉刀上阵。文章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写了七八个月，每一稿由张春桥夹在样板戏磁带里带到北京，毛泽东本人就审看了三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此时，身在北京的吴晗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上海的《文汇报》到北京一般要第二天看到。看到后，凭我当时的了解，和当时的认识，我是没有太吃惊。为什么没有太吃惊呢？我认为姚文元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完全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小棍子。他打了好些人，今天打吴晗就是了，没有太把它当一回事。大概第二天呢，就算第三天了吧。我就跑到吴晗那儿去，一个想安慰安慰他，一个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去了以后呢，他不像以前精神状态那么好，精神状态很沮丧。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有来头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来头？他就摇摇头，不说，走了。再过几天，北京大学的教授邵循正，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教授，是他的同学，特地从中关村跑到城里来看吴晗，结果在这之后马上就通报出来。

陈晓楠：通报什么？

苏双碧：通报邵循正去看吴晗。这样我就大吃一惊。原来吴晗已经被监视了。

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在北京市委里头有什么反响？文章出来的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就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跟郑天翔打电话。郑天翔是分管北京日报的。范瑾问郑天翔，怎么办？上海已经登出来了，这该怎么办？郑天翔琢磨了一下，说，可以转载。可是到了第二天，北京日报出来了，没有转载。郑天翔就问，为什么没有转载？范瑾对他说，邓拓不同意转载。到第三天报纸出来，姚文元的文章出来的第三天，十二号，邓拓召集范瑾、李琪这些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三条界定。一条，就是先摸一下上海的底，他们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这个摸底嘛，因为上海抵制得很厉害，保密很厉害，所以没有摸到任何情况。第二条呢，就是请示彭真，彭真当

时不在北京，请示他发表不发表？结果请示了以后，彭真认为先不发表。还有一条，各批各的，不是主席也说要批吴晗吗？他上海批上海的，我们北京批北京的。这样的话就界定了一个由邓拓跟李琪分别写文章，来批吴晗的历史观。是这样。做了这三条决定。

陈晓楠：实际上，最愤怒的人也许是彭真，在没有任何通报的情况之下，对他的副市长进行批判，这几乎是对他的公然挑战。彭真并不知道，他所采取的这种坚决抵制的态度，正在激怒毛泽东。坐镇上海的毛泽东本可以下令让各地转载，但是他就是要看看，北京到底会做如何反应。

苏双碧：到了二十几号，毛主席在上海生气了，说，北京不转载，出小册子，看他怎么办？就说把这个文章出单行本。然后呢，上海就给北京打电话，看你要征订多少？北京也感觉到。但是，北京也不知道是毛主席的意见，认为一本小册子有啥了不起的，就不搭理，也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就不搭理。所以，毛主席说出小册子还是不行，还是抵制的，还是不行。当然这个情况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知道在上海的毛主席有意见，就召集在北京的彭真还有各个报社的总编辑来开会，部署一下转载姚文元文章。

陈晓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十九天，《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被迫转载了这篇文章。

四大报纸在转载的时候，分别加上了自己的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斟酌敲定的，为了淡化姚文元文章中杀气腾腾的政治色彩，周恩来有意把文章刊发在了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而且在按语中也尽量把这场批判归入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到这个时候，其实连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批《海瑞罢官》真正用意何在，更不要说北京市委和吴晗本人了。

吴晗与毛泽东的关系是融洽的。毛泽东很推崇他撰写的《朱元璋传》，并且曾经写信建议他把朱元璋写得更好一点，因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虽然吴晗并没有照办，但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尊重的。

苏双碧：吴晗跟毛泽东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到石家庄去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两次，还给他写的信，还亲自看了他的《朱元璋传》的稿子。《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的时候，他特别签署的，请吴晗给他指正，签了自己的名字的一本书给他。所以，原来关系上还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就是这个。本来他是死心塌地跟着你走的，你对他也还不太坏，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一下子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是那么看的，为什么一九六五年初开始要批《海瑞罢官》，后来就拿吴晗开刀？我认为这里头很重要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主要就是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搞刘少奇。要把刘少奇搞掉，要把这帮人搞掉，这样的话他就找一个突破口，所以就找到吴晗。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搞吴晗，他跟吴晗没什么冤仇，他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搞了吴晗搞邓拓，搞了邓拓搞彭真，彭真一搞，刘少奇就跑不了。

陈晓楠：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他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逐渐产生不满，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收回他赋予刘少奇的权力。但是，在党内经营多年的刘少奇也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和势力，从中央到地方，他拥有一支精干有力的干部队伍，而北京市市长彭真正是他手下的第一员得力干将。

早在三十年代，当刘少奇在北方局主持工作时，彭真就在他的手下担任要职。从那时起，彭真就成了刘少奇心腹班底的第一号人物。当彭真在晋察冀主政时，主编《晋察冀日报》的正

是才华横溢的邓拓。五十年代，当邓拓因为没有很好地配合反右宣传，而被毛泽东从《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赶下来时，是彭真把他要回了北京市委。在批吴晗的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和在内，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保护吴晗。

苏双碧：邓拓告诉彭真，说，吴晗很紧张，吴晗思想很紧张。彭真就说，紧张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了就改，错了就检讨，对了就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他是中央主席。他这些话都讲出来了。管他是中央主席，连毛主席他得也服从真理。

陈晓楠：为了配合上面批吴晗的要求，邓拓煞费苦心，写了一篇从道德观的角度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北京市委同时决定成立以邓拓为领导的批吴晗小组，苏双碧也参加了进来。

苏双碧：成立当天，邓拓召开一个会，在这个会上邓拓讲了一些话，这些话现在看来那都是顶着，顶得很厉害的。一个，他说，姚文元文章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吴晗的文章不见得都错的，所以你们写文章不要受这个框框的限制。另外呢，写文章呀，要个人写，不要集体写，这个写作组不研究选题，没有选题，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再一个，他甚至说了罗隆基、章伯钧，姚文元他们的观点也不是定论，他突然就把罗隆基、章伯钧拿来，说明他气愤到什么程度，因为罗隆基、章伯钧当时是大右派，没有平反。他是故意整一下姚文元，就是说，你跟他们一样的，意见没有定论。

陈晓楠：这个小组存在了有多长时间？批吴晗的小组？

苏双碧：一直存在到大概有两个多月，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在里面呢不到一个月，可能就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一九六六年过新年以后，大概是元月二、三、四号，我到北京日报去，突然接到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立即过来一下。我就赶快从北京日报跑到北京市委去。李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电灯也没开，脸色挺阴暗。他让我坐下，我都有点害怕，感觉出什么事了。他就跟我说，上面决定要批邓拓。他说，老邓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们日子就好过了。

陈晓楠：北京市那种隐藏在批判之下的保护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底，他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此言为批《海瑞》定下了调子。

彭真丝毫没有感觉到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愤怒。他专程跑到上海，试图向毛泽东解释说吴晗和彭德怀其实没有任何历史关系。毛泽东认可了他的话。而这之后，彭真就真的以为此事可以偃旗息鼓了，于是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草拟出了《二月提纲》，希望将批判拉回学术的范畴，不要再进行政治的攻击。

苏双碧：《二月提纲》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一获得通过，彭真便急急赶去向毛泽东汇报。彭真、胡绳、陆定一亲自到武汉去给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可是在那个汇报的人写的日记里头，笔记里头，明确记的是主席同意了。彭真也认为问题解决了，给主席看，一个，没有发表反对意见，能说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那么在我看来呢，毛主席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提纲的。因为他旨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闹得越大越好，二月提纲把它规范了，就不会再大了，按照一定的轨迹来搞这场运动，搞成一场学术讨论。所以他看了以后，他把留在他那边的材料，有七八个材料，他批了，交江青保存，就说明他当时一个态度了，也没有退回去，就保存，保存了就可以算账。

陈晓楠：“二月提纲”出台之后一个月，毛泽东开始在会议和谈话当中痛斥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并且说，如此下去的话，将不惜解散北京市委。这时候，彭真才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不关痛痒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当吴晗、邓拓他们一个一个被批倒之后，下一个就要轮到他自己和北京市委。为了挽救北京市委，挽回自身，彭真在四月十六号不得不孤注一掷，做了最后一搏，他率先发动了对“三家村”的大规模批判。在这一天的《北京日报》上，用了三个版面大举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

“三家村”指的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和统战部长廖沫沙，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个专栏的始作俑者是邓拓，他成功地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所以才萌生了三人一起写杂文的想法。

苏双碧：这三个人互相之间平时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三个人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吗？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就是以文会友，就是因为大家都写杂文，正好北京市委《前线》杂志要开个专栏，所以邓拓就把他们两个找来，就这个事情把他们连在一块了，平时各干各的，互相都很尊重，但是，不是好朋友。

实际上，从六六年的三月份开始，毛泽东已经在秘密部署批判“三家村”了，彭真这样做旨在表明心迹。

那么这个大批判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认为北京市委这下要主动一点了，所以新华社已经拟了一个通稿，把北京市委的按语什么的发通稿，《人民日报》也准备要转载。结果，当天晚上中央来个通知，对北京市委批“三家村”的文章一律不予转载，大家原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不让转载。不让转载那就是说中央不支持了。就是说，北京市委也不做自我批评，也不检查，其实他自我批评检查很多的，说不做自我批评也不做检查，所以不去理他。到了四月十九号就正式通知了，停止彭真的工作。所以彭真就匆匆忙忙回到北京市委来了一下，传达了一下，说，从今天起有什么事不要找我了，彭真跟市委的关系到这时候就断了。市委就成为无政府主义状态了。

陈晓楠：北京市委瘫痪后，全国掀起了批“三家村”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各大报纸到街头标语，充斥了对“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不实指责。在一波高似一波的批判声中，邓拓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政治生命的完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两天，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

苏双碧：其实，真正直接触动他死的原因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戚本禹那篇文章，讲他是叛徒。所以他把他给的诬陷看成是上头对他的结论，

在邓拓自杀的前夜，妻子丁一岚也在隔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记得丁一岚跟我说，而且她就知道邓拓在给上面领导写信，准备要自杀。但是她当时就是感觉到邓拓太痛苦，怎么劝他？无所措词，是劝他承认错误？劝他去做检讨？邓拓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不会去做检讨，也不会去承认错误，我也不能这样劝他，就是邓拓自己想呢，死是一个开脱。完了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开脱，所以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面，她没有到隔壁房间去劝他。

陈晓楠：你是说邓拓在准备自杀之前，他夫人已经感觉到他想走这条路了？

苏双碧：是。但是她就没有劝。她劝他可能也是说了，但是没法从根本上劝他，就是劝他不死。

陈晓楠：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让他的秀才班子写出一份关于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后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振聋发聩的宣告。

苏双碧：当时决定搞这个“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毛主席叫陈伯达起草过这个通知，陈伯达起草的时候写了一句话，就是根据中央什么什么决定，撤消几月几号发表的，什么时候发表的，《二月提纲》，就一句话的通知。毛主席看了也生气，他说这些太简单了，不能说明问题。所以陈伯达又去起草，字数比这个多一点，把这个前前后后说得清楚一点，给主席看。主席说，这个不行，你从技术上说明撤消这个文件，这很容易，理论上你没有说明。陈伯达后来回来吓了一跳，说，要做一篇大文章了。要做一篇大文章，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写出来的。所以中央就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全都到里头去了。后来这个小组的成员就是后来的文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五·一六通知”改了多少遍，那些最厉害的，最重的话全都是毛主席自己加的。

陈晓楠：“五一六通知”说，这场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后，通知警告说，那些被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革正式开始了。

苏双碧：在“五·一六通知”以后，对“三家村”的批判就从思想上的批判转入肉体上的批判，一天批斗最多三次，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一批判就是“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就是两个手绑在后头，知道吧。所以批斗的时候都是很惨的。

在吴晗没抓起来以前，三天两头要到家里去揪人，去揪来批斗。红卫兵一冲进去，叫吴晗在太阳底下跪着，拿皮带抽他。他那么一个老头哪受得了？他女儿小彦那时候才十几岁，看到这样，一扑上去躺在她爸爸身上，她求人家，她说，你不要再打我爸爸了，他受不了。那个造反派里头也有些个别年岁大一点的，就答应她，说，这次绝对不打他，结果斗完回来以后，吴晗笑嘻嘻地跟她说，我多亏了小彦，所以今天我没挨打。

陈晓楠：一九六八年春，吴晗被关进监狱，夫人袁震也进了劳改队。家里只剩下小彦姐弟。

苏双碧：一天晚上，袁震被放回去看看家。结果一家人挺高兴的。万里知道袁震回来了，赶快叫家里人熬了一锅红豆粥，送给袁震。袁震和儿子、女儿三个人喝完了红豆粥挺高兴的，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半夜就发病了，赶快送到医院去。说起是吴晗的老婆，医院里头也不敢抢救，也不进行抢救，所以就没有救过来。快到天亮的时候，袁震眼睛睁开了，小彦就说，咱们身边只有一个苹果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把这个苹果削削给你吃一点？袁震摇摇头说，不，她说，想喝一碗粥，结果小彦赶快去找医生去，说能不能让厨房熬一碗粥给妈妈？医生也不答应，过不久袁震就死了。死的时候小彦跪在那儿哭。哭着哭着，发现袁震眼睛的两边两滴眼泪，所以她就感觉到她妈妈死不瞑目。后来做梦也好，什么也好，老是梦到她两滴眼泪。而且到处问人家，人死了还会不会流眼泪，她就幻觉了，她感觉到她妈妈可能没死，就这样。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垮台已经两年，但是“文革”却没有被否定，这时候苏双碧已经从北京市委调到了光明日报当记者，而作为吴晗的老部下，他觉得有责任让吴晗的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找到的知情人都因为害怕担责任，不愿意写文章。

苏双碧：结果有一个人，中宣部里有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局长黎澍，他说，如果知道批吴晗的背景，他就可以写。后来我说，开玩笑，批吴晗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有什么不

了解的呢？但是就是提出这样的要求，黎澍感觉还应该去努力。黎澍就说，谁最了解批吴晗的背景呢，彭真最了解，所以应该去找彭真了解情况去，但是不知道彭真在哪里？当时就找到他同楼的一个高干的女儿，她知道彭真在陕西商洛地区招待所。所以第二天黎澍就叫人买了两张飞机票，派了他的一个人跟我一快去赶到西安去找彭真。人还没去，飞机票买了，第二天要走，当天晚上接到陕西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愿意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彭真不同意见，所以这样也不行了，也不行了没办法走，几条路都堵死了，后来我说我自己来吧，后来我自己花了两天多时间，写了一篇《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在《光明日报》发了。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十三年，第一篇为吴晗和《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终于面世了。一年后，吴晗夫妇和“三家村”获得正式平反。

□ 摘自凤凰卫视节目《口述历史》

~~~~~

# 【参考资料】

##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 司马璐 •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

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一九六八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一九七四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过他们。国焘先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逝世。

中共的资料中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八十三岁，张国焘逝世时八十二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一年而已。

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八十二岁的。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功过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档案的开放。张国焘与我亦师亦友，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历史的真相，虽属片面，但自信忠实。张国焘为人自然有他的缺点，否则他怎么到最后——一败涂地？假如由于他的失败而否定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这是很不公道的。

~~~~~

【千秋功罪】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下）

• 方 丈 •

七，整肃彭德怀以后的刘林保驾

文化革命有几年的酝酿期。事情的发端是大跃进。毛个人应对大跃进负责。因为中国本有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当年的计划。毛泽东抛开经济部门，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工作，发动一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运动。他自己直接指挥各省的“跃进”和全国的大炼钢铁。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都靠边站，没有发言权。大跃进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几千万人饿死（数字无从查考）。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一次是59年庐山会议以前，叫做一次跃进，庐山会议之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或毛泽东自己正确，全国进行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二次跃进”。从59年下半年，到60年底。那时农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仍然推行极端严厉的措施，不允许农民用个体经济自救。连庭院养鸡也禁止。使经济每况愈下，毛泽东才在61年被迫把日常政务和经济工作，交还给刘周陈邓等人。但是他还掌握最主要的决定权。所以毛根本就没有“退居二线”。退居二线之说，只是误解。因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是二线职务。当时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才是二线职务。这两个职务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实际上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扩大了他的权力，因为他抬出刘林二人，树立此二人的特殊地位，由刘主政而林主军。从而把其余人物都被挤到后面，权力因此集中在毛的手中。抬高刘林在当时就是抬高毛泽东自己。因为刘林是毛的亲信。刘少奇是延安时代树立毛泽东党内绝对权威的发起人。当时的刘的作用，就像九大时的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实以刘少奇为第一先锋。早在1943年刘少奇第一个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此被沿用至今。刘少奇资历在党内并不十分深厚。在20年代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共的大部分领导都已经重权在握。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刘少奇还在安源搞工运，建立学校。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最大的功劳，是批判王明。王明在中共党内有很大影响。因为共产国际曾经支持过他。他曾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持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后来主持中央，有自己的一派人马。但是在延安之时，斯大林已经放弃王明而选中毛泽东，毛正要肃清王的势力，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当年王明没有把毛整死，毛就翻过身来了。王明的势力基础，是中共内部的留苏派和地方派。而刘少奇自己既是地方领导，又曾经在苏联受训，他手下还有一伙留苏分子。所以整肃王明，非依靠刘少奇（陈云也有大作用）不可。简单地说就是以刘系人马代替王系人马。光靠毛泽东掌握的军队干部，替代不了王系。刘少奇在30年代后期主动发起拥毛反王，把他主持的北方局变成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的基地。这对赶走王明，树立毛的领导地位，起重大的作用。从此之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不再受共产国际的威胁。而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也剩下不多。（1954年，在斯大林死后，毛发动整肃高饶潘杨，知情人认为，毛怀疑他们是斯大林的内线）。刘是留苏但是不和苏联联系的人。对毛来说，这点难能可贵。在中共七大会场，主席台的上额有大标语，上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从此正式确定毛泽东在中共的永恒和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这么一种地位。刘少奇在七大作的报告中，有105次提到“毛泽东”。

其他人竞相效法。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最主要的报告是政治报告。七大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作，八大的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作，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作。七大由刘少奇发起造神运动，经过八大造神成功。到了九大，林彪把神变成“天才”，只是刘少奇在七大时的“造神行动”延续。所以刘少奇在七大前后，地位飙升，按说他比周朱二人的资格威望功劳，都小的多。这时刘毛之间已经建立特殊依存关系。到了八大（1956年）的时候，刘正式成为毛的接班人。在1959年毛泽东把国家主席之位让与刘少奇。在国庆节游行的时候，宣传部门规定群众依次喊“毛主席万岁”和“刘主席万岁”。如此，已经是第二号人物的最高待遇了。所以说毛刘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林彪，从来就是毛的亲信。毛在井冈山的时候，为抗衡朱德，力抬林彪，使朱德有职无权。朱德为人宽厚，尽量忍让。（朱德对朋友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我就是不生气。毛在井冈山拿林彪来气我，我就是不生气。谁有本事就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把我惹生气了）。后来林彪的地位一路飙升，最后掌握着力量最强大的四野。但是在解放之后，林彪身体不好，因为战伤不愈，迎风感冒，听水拉稀，见光过敏。需要吃鸦片镇痛，一直不能工作。在麦克阿瑟的韩战回忆录《老兵消失》中，说起美军在朝鲜缴获一份文件，说中国准备让林彪领导志愿军赴朝参战，该文件应为美军自己假造。因为林彪当时的身体根本不能赴朝作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现必须把军队控制在亲信手中，所以勉强把林彪抬出来，因为他身体太差，只好由贺龙罗瑞卿等辅助。但是林彪和其太太不行政却主政，不做事却管事。有了他办不成事，没了他是不尊重。当然引起人们不满。特别是贺龙罗瑞卿发动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成绩很大。抬高了这二位在军内的地位，连他以前的老部下罗瑞卿（林为抗大校长，罗为教务长），也觉得林彪碍事。使林彪感到了威胁。为此林彪学刘少奇，也让太太叶群搞了一次“军内蹲点”，到某红军师蹲点之后也写了个报告，说是罗瑞卿的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特别是罗瑞卿后面有贺龙，而贺龙一直是毛泽东嫉恨的人物。因为贺龙人望极高，又很能干。为一突出的帅才。而且从延安开始，贺龙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从来表现消极。贺龙的人望就是“潜势力”。关键时刻能发挥出来。就是不自己夺权，也能决定大势。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特点，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说读书人根本不能建立朝代。中国建立朝代的君主，不是出身草莽，就是世代王侯。所以毛对书生出身的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并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贺龙朱德。特别是贺龙。贺龙在军队内部威信极高，南昌起义的时候，就以贺龙的军队最多。林彪说他为什么要整肃贺龙，是他考虑到“主席百年以后，那时候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前必须解决贺龙。整肃罗瑞卿就是整贺龙。只是贺龙比罗的势力大，不能一起整。文革一开始，搬倒了刘少奇等人，就开始向贺龙下毒手了。文革以后周恩来数次保护贺龙，最后毛泽东和林彪点名要贺龙，周恩来也藏不住他了，只好把他交出来。贺龙不久被整死。在文革后期，贺龙死了，朱德还活着，在1976年毛泽东生病的时候，朱德身体还好。朱德在会议上对江青说：就是主席死了，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呢。结果过了不久，朱德因为拉肚子（吃黄瓜），送到301医院治病，就死在那里了。

文革时期的301医院黑幕深不可测。因为当事人部分自杀，部分内部处理，这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可从张爱萍的经历，看出其中险恶。他在301住院养伤期间，有个白大褂送给他吃一副汤药，若不是当时负责警卫的赵某抢救及时，一定也死于非命。我们知道有个叫做傅连璋的卫生部长，在瑞金的时代就参加红军。一直负责中央高官的保健。一次毛泽东问他林彪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毛说林彪有吸食鸦片的问题。结果文革中傅失踪，毛泽东说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骨灰盒也是个空的。据传是让林立果学意大利电影，把他封在水泥块里，作了地基。（下面一事可说明这些人的手段：文革前卫生部有一位保健局局长季某，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在文革一开始被揪到北京医院作脑颅造影，往脑子里打了一针，就变成植物人，只能跪在床上，文革以后才死。他太太是协和医院某科主任）。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文革中的高层暗杀。这类谜案有很多，就是亲身经历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搞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但是其中很多是声东击西，烟幕掩护。群众互相整来

整去，你死我活，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是马列真谛，这时候上面的掌权的，就好干自己的事情了。大家都知中国兵法，有兵不厌诈，暗渡陈仓等计。游击出身的中共高官，早把这些策略融入血液，变成第二天性。如果作事不使上这些办法，全身都不自在。之所以说文革在国外陷入学术误区，是因为现在学术注重事实凭据，此为“实证科学”的特点。但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史，难分实证和假造。因为能收集到的证据，或是口头谎言，或是有意假造。关键实证或被销毁，或被秘藏，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作重要的事情，从来不留文字。结果谁造一些东西出来，说是“机密档案”，大家也就会相信。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毛泽东把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务，在军中威望上升，威胁林彪地位的情况，当作贺龙在军内夺权，威胁自己的信号。所以坚决支持林彪整肃罗瑞卿，把贺龙从军队中赶出去管体育。从此林彪在军队的地位至高无上，其他老帅都不敢过问军务。解放军把练兵演习放在一边，专门学毛选。林彪提出“四个第一”，而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全国要学解放军。林彪在抬高毛泽东的同时，自己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由此我们知道，刘林二人是毛泽东的两员大将。毛泽东靠抬高这两员大将，打压排挤了其余人物。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林二人得到毛泽东的特许，把自己的太太搬到前台。我们知道，中国对朝臣的最高待遇，就是“封妻荫子”。封妻就是给太太干部级别待遇（但不参政），荫子就是让儿子当官掌权。当时惟有刘林二人有此殊荣。虽然很多人的太太资历远远高过刘林的太太，但只能靠自己的资历担任妇联等部门的职务。

八．毛林的无能和刘少奇的领先

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两驾马车”结构。两马就是刘林二人，车就是毛泽东。选择刘作驾辕马，早在七大期间就决定。对林的启用，实在是因为毛泽东无其他可信任的元帅级人物。其他人都为这架马车帮忙，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但是两驾马车结构是基础。以此基础，毛泽东就可牢牢掌握中国的大权，并驰骋于国际政治舞台。但是该结构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那些帮忙的，也觉得毛林无能，心中不服。这—是因为刘少奇能力远比毛林为高。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而经济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但是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 S/V 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极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如此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还自认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钱。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手不碰钱，是古代帝王的规矩。因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只抢不买。拿你的是收贡，给你的赏赐，都和买卖无关。钱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钱则属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欢作买卖的帝王，多数亡国。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零。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虽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没有起码常识。要说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难道不知道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能”。谁要说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倾反革命。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一说田被秘裁）。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共产党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作不好吗？我们相信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炼钢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8元，但有人回忆说是2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300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让初中生“小谢”去整北大的“王八”，让毛泽东过瘾了。另外毛泽东还有一特性，就是“绝对要赢”，绝对不能在人之下，只能在人之上。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因为刘备认为比他年轻的诸葛亮，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那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尔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的太远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面都高于他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吗？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泽东的治国能力，当然也只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跃进以后，很多干部的都对毛的能力有了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但是谁都知道这事能想不能说。只有个别入或是因为一时疏忽，或是因为实在憋不住，把这想法表现出来了，这些人中包括刘少奇。

至于林彪，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和经济工作，身体又差的干不了什么，只能算是个“老骥伏枥”。结果造成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的状态。这也是因为刘少奇确实比他们俩能干。

当时大跃进把中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不能理解。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

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刘少奇一辈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使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中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年一月十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必须说，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毛泽东张国焘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包括老左曾希圣，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让他发言，他说要“等等看”。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发言。

刘少奇确实是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

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

九．桃园经验，毛刘开战

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比如在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64年的刘太的桃园经验。以笔者之见，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所以在63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情况如下：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312页）

关键问题就是笔者划了横线的那句话。有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先生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

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共产党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共产党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运动是共产党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

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篇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宗仁部），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毛的书。毛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却一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掙，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十．陈云的先见之明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7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而且是冒死坚持这一有成效的政策。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

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在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的当政时（1964—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

受歧视)。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70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笔者认为不确）。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进京领导公安部军官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十一．灵魂深处的大敌

64年刘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之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以笔者的经验，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66年7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1976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镇压控制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为实现这一计划，必要的措施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这样，传位也是为了保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在老年无能的时候，不被别人打到。死后也不会像斯大林一样，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作的那样。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

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这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可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谁要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好”内容，只能说是上了毛泽东的当。

十二．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成败

毛泽东失败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泽东最终没有在干部和民众的心中，制造出他希望出现的那种“灵魂”。这种灵魂在文革后期一位军队干部心中得到实现。这人就叫做门合。姓门名合。这位干部有四句名言，被广泛宣传。这四句话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维护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XX毛主席。这个XX是什么已经忘了，四句话的顺序也可能有错。但是不管XX是什么，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盲目地忠于毛泽东个人。后来周恩来说，门合的四句话不科学，不要宣传了。怀有门先生这种心态的，只是极个别人。至于金日成在朝鲜是否成功地制造了心态，我们不清楚。可以确信的是，朝鲜弥漫着对金日成家族的恐惧。应该说金日成对民众和干部的迫害，其残酷程度，和深入程度，远超过毛泽东。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办法，看谁可疑就把谁立即结果。朝鲜人随时有“失踪”的可能。而且失了踪家人也不敢问。结果朝鲜人的“灵魂”被恐惧充塞。并转化为崇拜或麻木。“灵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国文革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鲜。如果比得上朝鲜，说不定中国现在也和朝鲜一样了。为什么中国的迫害残酷程度稍逊一筹？因为到底中国干部民众的文化传统深厚，共产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经验，了解了一些事情的人，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丑恶。就会抵制他们。朝鲜作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很难长期大规模实行。因为广大干部群众反感。

毛泽东传位失败的原因，还出在后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时已有一伙自己的干部，形成一个集团，该集团成员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国家权力。虽然这能把国家搞成破烂摊子，但是他们能够得意洋洋。金正日的这伙干部，很多是他上大学时代的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从小就培养的战斗孤儿。毛泽东没有培养出来这么一伙人。毛远新一一点也不把自己的军工同学当作资源。他对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反感。军工学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奋，心胸远大的学生，他们比毛远新更努力，成绩也更好。而且，军工学生中有20%来自干部家庭。他们对中共和中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毛泽东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较少。所以毛远新非但不能用这些同学，反而害怕和疏远他们。这是毛远新失败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我们再看蒋经国和毛远新之差别。首先蒋介石家庭的资源比毛泽东的雄厚。因为宋美龄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蒋经国在苏联作基层工作9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蒋介石培养了他。回国后在赣南工作，培养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以后在情治部门担任领导，后来担任过行政院长。蒋介石死的时候，蒋经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而且羽翼丰满。而毛泽东死的时候，毛远新的政治经验还不及格。另外，毛远新从小在高层的呵护下生长，根本就没有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对政治险恶，人生艰辛全都不懂。就是让他作个班长也不能胜任。如何能让他接班？

江青的出身不能和宋美龄相比，性格和智力也不算上乘。特别是后来玩弄男宠，并让他们担任国家领导，还当众说古代女王应有“面首”。“面为貌美，首为发美”。这种东西公开出来，怎么能让中国人接受？美国总统克林顿搞了点男女关系，都差一点下台。江青有了这样的事情，还怎么能继承共产党的领导权？江青毛远新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都极度张狂。毛泽东临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远新的地位，让他担任“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毛泽东指示。自己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个党的副主席”。在毛泽东的最后时刻，毛远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后，如果皇后掌权，必然不利于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亲生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江青和毛远新真的掌权，那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番争斗。当时陈锡联已经调到中央，算是毛远新的军事基础。毛泽东在死前曾经批评过四人帮，算是为以后毛远新在适当时候，抛弃四人帮作准备。毛泽东可能认为，如果毛江争斗，华国锋和汪东兴陈锡联都会站在毛远新一边，毛远新可能胜利，建立毛家天下，让他毛泽东不输于蒋介石金日成。

十三．太子在辽宁作了什么

在文革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继续实验毛的公社化。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

市场、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没有敢废除这三条。可能是基层干部都知道这三条对农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辽宁毛远新搞了个“赶社会主义大集”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就把这三条废除了。其中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在75年才开始的。以前农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75年毛远新命令农民到集市上把东西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当然那价钱比市场上低一些。农民当然不愿意。不愿意就抓。从城市里面派出工作队，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个老乡提着鸡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头，就让他放下，鸡蛋是7分一个收购。在集市上可以卖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这种比例低价收走。有的老乡说鸡蛋是给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儿的，那也不行，你不卖可以，但是要惩治你。就是把你的鸡蛋打破，让你卖不成。当时从城市里面抽调来的工作队员，多是在工厂里面不干活的年轻工人，其手段也类似流氓。收购上来的东西，本来不多，因为人们知道了这回事，都不敢来赶集。收上来的东西，大部被这些人私分。

对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办法，是勒令每户农民以国家收购价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有的农民并不养鸡。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钱买鸡蛋，也得缴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种。实际上就是没收自留地。

毛远新还继承当年公社化的办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结果和公社化的时候一样，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经济灾难。当时为了表现积极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战”。就是在晚上点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网化”。这事情没有一点科学性。一来是在挖水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地势的高低，和水的来源。另外辽宁省的农业区正好是以前的辽河冲积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进了渠道，马上都渗入地下。结果只是破坏了大量的农田。而且人在晚上干了活，白天必然睡觉。还不如白天干活。当时东北农村的劳动力并不富裕。这样大量地浪费劳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坏处。

也就是说，毛远新在辽宁，几乎把当年大跃进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证明，当年那么干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与他期望的相反。当时辽宁是全国供应最差的地区。当时全国各省的食油供应，为每人每月5两。而辽宁为每月3两。人们戏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军区干部在作报告的时候，对群众说，以辽宁的情况，每人三两油已经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两油就够了。但是军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军队自己有农场，每年的收获可给军官一些油。当时为了提高产量，种的吃的多是杂交高粱。这种东西很不好吃。只有军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当时军官在辽宁的地位最为崇高。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军官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平民强了不少，但实际水平（绝对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军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鸡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没有什么了。

毛远新也把毛泽东知识份子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有个张铁生。这件事不能怪张本人。他只是个下乡青年。毛远新把他抬起来，目的是要把已经很倒霉的知识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从此发明了用高中或大学试卷考教授。北京大学的军管会迟群等人就对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击考试。并公布成绩。全国大学考教授成为风气。并让“工农兵学员”上学，在学校里监视管制教师。

十四．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张玉凤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死时，要求毛泽东给个名份。毛只作个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

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张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所以这两个人必须作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一味吃喝玩乐，上海小开气息十足。我们说过，毛泽东极不善于识人，不管是找太太和找部下，都找不好。中共内部充斥非常能干的人，但都是自愿革命，靠军功政绩崭露头角，而非靠毛泽东发现提拔。所以他找王洪文当接班人，又是一个大错误。毛泽东为江青培养干部的时间只有文革这么几年，等到他在75年发现王洪文不中用，也来不及换人了。

这时发生了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人。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多年的历史，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十五. 接班和进步

解决四人帮，是场宫廷政变，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宣布逮捕四人帮的时候，某军总部礼堂的掌声长达四十分钟。一时北京商店里的酒被买断。对于共产党以后的领导人，算是一个警告：在中国再搞家人传位，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连毛泽东这么大的资源，苦心经营十年，都未能成功，别人有什么机会？吴法宪晚年回忆时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这就是觉悟。觉悟到政治家庭化，在现代中国是死路一条。以后几代领导，都选择非嫡系干部作接班人，顺利移交权力，这也算是进步。如果每次接班都和毛泽东一样这么闹，谁也受不了。文革确定了“接班办法”，也算是有点成绩。这点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要和中国几千年皇帝传位的传统作斗争。应该说周恩来先生是这场斗争的旗手和领导。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却断掉了毛的死后。这两件事是有辩证关系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肃了。周也就没有机会破坏毛的传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绝对没有可能接班。他们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战。这也是江青在 75 年急于发动“批周公”运动的原因。以该运动的势头来看，周恩来如果不得癌症，毛泽东和江青就会把他整死。笔者当时在某工厂作一普通工人，当时全厂停工，整天学习“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强大的运动攻势，显示毛江势在必得，绝不会因为群众不满，而对周恩来手软。后来毛江得知周恩来的病情，才放松了整肃他的运动。说实在的，全国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活得比毛泽东长。周一死，则民众绝望，最后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间挺身而出。这件事好像芭蕾舞剧《天鹅湖》。天鹅湖的结尾有两个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敌被杀。而共产国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际，已经绝望飞走的弱小天鹅，飞回来保护王子，他们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个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鹅。四五事件是老周的灵魂领导的最后一次阻击战。和以前的阻击战一样，它不能胜利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

十六．帝制和共和

文革一开始，就被说成是一场民主运动。而且说在造反之后，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对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有很大的诱惑力。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毛氏烟幕弹”中的几股烟尘，不值得认真对待。文革中以前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乱，人们提出各种理论，青年人的思想空前活跃。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局势和未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现在很多人知道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惨死于文革，67 夏天笔者曾和郭先生在颐和园见过面，他和他的朋友孙经武（与郭在文革前一起建立 X 社，并一起坐牢）皆认为，文革一来他们感觉比以前更安全了。孙先生还能在当地造反派中参与一些技术性工作。郭先生也觉得比以前自由。但是不久之后，二人都受到残酷迫害。另外还有一事，或可以作类比：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时候，一工人队长宣布，中央马上就要作工资改革，工人将得到干部和教授的工资，而干部和教授或者拿低工资，或者什么也拿不到。我举出这两个例子，只想说明文革十年形势变化莫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中产生不同想法和期望。好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但是如果从历史鸟瞰的角度，可把文革看成中国历史长河的一幕。那就是二十世纪的共和与皇权之战中的一役，可能是最关键性的一役。

“共和”本是中国古词，指西周一段特定时期，始于公元前 842 年的周厉王时代，因为厉王昏聩无道，周王族的其他诸侯把他赶走了，由当时的周、召二王（同是周王族）主政。近代中国启用这个词，一方面利用其“把皇帝赶走，官员或大臣主政”的意思，但是主要的含义还是西方的。西方的共和 REPUBLIC 来源于拉丁文的 RES PUBLICA。RES 的意思是“物”，PUBLICA 的意思是共有。共和的意思就是大家共有之物。我们先谈谈这个“RES”，在这里专指“国家”。但是对“国家”包含一些什么资产，各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向往共和，其国名都有 REPUBLIC。但是共产党的理论是“国家”包括几乎所有资源和财产，也就是所有生产资料、国家机构和自然资源。而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包括国家机构的全部，和资源、财产的一部分。至于这“一部分”是多大的一部分，各国在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共

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特点都是“共产”。只是共产的程度和多少的问题。共产理论把共同财产的范围划得很大，以至于没有留下多少作为私有财产。而资本主义理论把这个范围划得比较小，留下相当大一部分给私有财产。但是应该说这个比较小，也还是相当大。我们知道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财产非常庞大，政府及其设施，军队，税收，国有资源，等等，都是国民的共有财产。相比而言，欧洲以前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其特点是国家是“王产”或者“皇产”——国家财产是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他死了由他的后代继承。中国有大约三千多年的“皇权国家”传统，要结束这一传统，建立“共和”，当然很不容易。二十世纪中国出了几个领袖人物——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企图把“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都失败了。这三个“枭雄”，若是在十九世纪或以前，或许都能建立王朝，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们都不能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其基础性和必然性。其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皇权国家”在中国的民众之中失去了市场。这种国家根本不是西方共和列强的对手。皇权国家没有力量，没有人愿意为老皇上和他那一家子卖力卖命。而西方共和列强诸国，却都有很大一笔公有财产，他们有很多公民愿意为这笔资产的获得和增值而卖力气。因为这些资产增值了，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有好处。所以皇权国家和共和列强打起仗来，根本不是对手。可以这么说，在国家形式方面，共和是强者适者，而皇权国是弱者废者，一定要被淘汰。淘汰可能取两种过程，一种是被外来力量消灭，另外一种是自己内部造反。推翻皇权，建立共和。或是前者，或是后者，反正皇权国家是绝对不能生存下去了。这是所谓“历史的必然”。

皇权失败的还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有了周恩来和一批共产党干部，和广大民众中的志士仁人。他们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为铲除皇权，建立共和而奋斗牺牲。他们兼有共产和共和两种理想。他们的党叫做共产党，国却叫做共和国。这两个理想有相同之处。我们说过，共和和共产的区别，只在与“共同财产”范围的大小。他们有共产和共和理想也是很自然的，谁也不想把一国之资源全给一个人，而别人都作他的家奴。历史也告诉他们，皇权制度的中国，必然被共和列强蚕食和消灭，中国人只能作亡国奴。说实在的，在文革初期，很少人能看出毛泽东是想建立皇权。人们以为他企图建立更广泛的共和。我们在上面说过，共和为国家共有的意思，但是有一问题，就是：在谁之间共有。这个国家，是谁们的共有国家？这个“PUBLIC”一定有一个范围。中共的国旗上有五星，声称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本家共有中国，但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划在了公民之外。这部分就是所谓地富反坏。这一范围可以任意扩大。后来又加上了右派，走资派，知识分子，等等。

中共建国之后马上开始了斗争和运动。所有运动都是“夺权运动”。就是分期分批，按计划地把各类人物的公民权夺走，把你的“共有”权利取消。一方面把权力渐渐向共产党干部手里集中，另一方面，把干部手里的权力逐渐向毛泽东手里集中。继“地富反坏”被整肃之后，工商业主（民族资本家，在三反五反中）的权利被剥夺，后来是知识分子被夺权（在反右中）。同时又有很多干部被整肃。到了1966年，毛的夺权目标是其他共产党干部。其他人的权利已经被他剥夺了。知识分子不能说话，冶金专家不能对大炼钢铁发言，农业专家不能对深耕密植发言。现在只剩下共产党的部分干部还有点权利。他们认为自己对国事仍有一定的发言权。比如彭德怀一伙对毛提出指责。刘少奇一伙则另外搞了一套。并企图动摇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文化革命是这一系列夺权运动的最后一步。也就是把所有人——包括干部，的权利都剥夺了，所有权利都归于毛泽东本人，这样皇权就告建立，而共和彻底被消灭。但是毛泽东为了剥夺干部的权利，提出的口号，是把干部的权利交给群众。这算是他的“策略杰作”。因为在以前各次运动之中，人民被剥夺权利，但是共产党干部的权利，相对地集中和扩大。在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之间发生冲突。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应该领导建设。因为他们懂而干部不懂。干部乱指挥，事情搞不好。反右把知识分子整肃了，权力都集中到干部手里。以后干部乱指挥也没人敢说话。所以才有大跃进那样的胡搞乱搞。这样干部就不得人心。民众对共产党干部反感。毛泽东号召民众造反，剥夺干部的权利，整肃干部，很多人很高兴。但是，他们没想到，干部的权利没有交给民众，而是被毛泽东收走了。以后的干部也没有发言权了。

只能对毛泽东俯首听命。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说，那时候多好啊，可以把干部揪出来斗一顿，甚至打一顿。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民众的生活更为困苦，局势混乱，经济崩溃。所以在文革整肃干部，实际上是想收回干部的权利，使干部变成毛氏家奴，把民众变成奴下之奴。而部分民众认为是把干部打到，权利归于民众。上面说过，这类不符现实的想法，人们产生过很多，笔者自己就经常被各种宣传蒙得晕头转向。事实证明，一党之国，还是比一人之国好很多。干部共有之国，比毛氏独占一国为好。当然干部共有不如全民共有之国。一党之国不如多党之国。但是到底一党拥有的国家，还算是共和。而一人拥有的国家，就是彻底的帝制。我们应该看到，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就是从一党之国，向一人之国倒退。从干部共有，向一人独占倒退。很多人为了阻止这一倒退，在斗争中牺牲。有人会说，“干部共有”和“一党之国”有什么好，也值得为它们奋斗牺牲？可是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不阻止倒退，根本也就不能进步。打阻击战只能步步为营。所以他们斗争牺牲还是很有价值。但是所有斗争都失败了，权力不停地向毛氏家庭集中。毛氏权力一步步地扩张。文革是毛建立皇权的最后一战，也是周保卫共和的最后一战。他们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

毛在死时，并不知道他会失败，周在死时，并不知道他会成功。

□ 2004. 4. 20一稿，2005. 7. 4二稿。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